

# 看不见的景框

INVISIBLE FRAME

冯路 / 著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 看不见的景框

INVISIBLE FRAME

冯路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景框 / 冯路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1

(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

ISBN 978-7-214-09004-1

I. ①看… II. ①冯… III. ①建筑艺术—艺术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580号

## 看不见的景框

冯路 著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李文玲

责任监印: 安子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 022-87893668

网 址: <http://www.ifengspace.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33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号: ISBN 978-7-214-09004-1

定 价: 29.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销售部调换)

# 序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在过去十年间写的各种文章，有关建筑或城市。一方面，这是个人写作的历史档案；而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史也同时是观察和了解当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窗口。因此，重读过去的文章，即使发现早前之肤浅，又或观点已变，也仍然保持原意收录，只是文辞略有删改。文集中，大部分文章或者关注当时的专业热点，或者评论重要事件，又或者是对建筑学的自省。个人认识的改变和关注焦点的转移，恰恰呈现了时代变迁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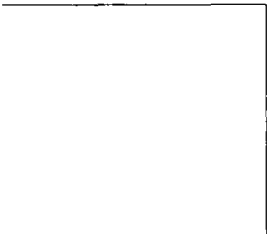
评论是一种对他者的即时观察，也是一种参与机制和理论实践。它从某点向外发散，或者将热点进一步扩大，或者推起新的高原。建筑评论，在设计实践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学科知识的生产。因此，建筑评论与理论和设计一起共同参与了建筑学知识整体地形的建构和呈现。

正如文集里的一篇同名文章所言，建筑有时候可以被看做是城

市文化的景框。建筑的空间形式不但容纳与规训城市日常生活和事件，而且使得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关系投射出来。正因如此，文集中的很多文章从建筑开始，而末了，都必然走向城市。

景框是一种呈现机制，它生产出千变万化的风景。以个人呈现历史，以评论呈现学科，以建筑呈现城市，这是三种看不见的景框，也是这本文集所隐藏的多重景深。

# 目录



- 001 我们向哪里去？
- 003 伦理与乌托邦：中国当代建筑的社会处境
- 012 新天地：一个作为差异地点的极端形式
- 021 16千米：在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滑行
- 029 对“朱文对‘朱文’的批评”的批评
- 034 距离
- 044 “此时此地”的现实
- 052 瓦园三惑
- 058 半透明性与时间—影像
- 069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19 问
- 074 中国式奇观：上海世博中国馆设计竞赛
- 076 建筑学知识的两种形式
- 087 看不见的景框
- 097 重新建构——《建筑文化研究》“建构”专辑书评
- 104 在那儿，什么超越了建筑？
- 106 1998 年世博会葡萄牙馆

- 114 谁展谁览
- 118 参数化和被参数化
- 125 未来城市的电影剧本
- 134 有关密度
- 140 一日二城：成都和谢菲尔德
- 147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术馆？

# 我们向哪里去？

我坐在岸上，  
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

——《荒原》，艾略特，1922

在大学教育里，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被“功能 + 形式”的简单组合分解成一连串的设计题目成为学习的对象，建筑被当成一个孤立的审美对象，并表达设计者体现自我的欲望和快感。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结果与建筑师所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有着非常大的反差。

在我看来，隐藏在这种反差之后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建筑师职业本身之认识的缺乏，或者更准确的，是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建筑师职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缺席。建筑教育里，专业知识常常或者被当成谋生的工具以体现个人价值；或者被当成某种“边界”，



仅仅依靠一些玄妙的词语和符号，单纯地把自己圈养在专业的地盘里而傲慢地拒绝“陌生人”的进出。但是，怎样利用专业知识解答建筑与社会之间、建筑师与使用者之间、艺术与技术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必须首先建立在自身的明确定义之上。对建筑师职业认识的模糊状态，决定了建筑教育中所出现的各种偏差。例如，对设计作业“表现”的过分重视。虽然建筑师的表达方式可以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虽然对成果的包装是商业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状况，但是任何把注意力优先放在“表现”而非“设计”之上的做法都是缺乏专业精神的。如果学生及老师能清醒地认识到建筑师的价值体现：个人价值体现在建筑创造，而社会价值体现在协调均衡各方关系而获得社会意义与终极关怀，那么，美学的“表现”就不会占据专业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而学习者也不会单凭花哨的图面或时髦的建筑式样获得别人的关注与尊重。

批判性思考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建筑师不应该回避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因而也不能回避对自身状况及所处社会领域的批判性认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应该建立在该职业历史的有效梳理之上，建立在对相关社会状况的深入观察之上，建立在对伦理和道德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对建筑永恒之道的不懈追求之上，建立在建筑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结合之上。只有当具备了对建筑师职业的正确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建构我们的专业教育；而建筑师职业价值观的传授，将是我们建筑教育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教育的意义是使我们终生追寻那依稀的灯火，而不让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情感洋溢的风格背后，如卡夫卡所说。

---

\* 本文原载《时代建筑》2001 年教育增刊，文字略有删改。

# 伦理与乌托邦：中国当代建筑的社会处境

难道建筑不会继续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令人迷惑的世界中找到位置和方向吗？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谈到建筑的伦理功能，“伦理的”（ethical）衍生自“精神气质”（ethos）。

我们谈及某种社会的精神气质时，指的是统辖其自身活动的精神。对建筑的伦理功能，我指的是它帮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sup>1</sup>

——《建筑的伦理功能》

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建筑师的社会职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与差异。这种冲突与差异在表面上可以解释为建筑师的个人或群体的专业能力和迅速发展及日渐成熟的市场之间不相匹配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计划体制下的设计单位工作方式与组织结构面对商业化的市场所表现的力不从心。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纳入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背景之下展开讨论，将有益于更

深入地分析当代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困境并思考前行之路。

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曾经在《空间·时间和建筑》里提出建筑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是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而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则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建筑的任务是诠释，是什么意思？建筑师能利用何种诠释工具呢？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其次，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什么生活方式是可取的？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取的生活方式吗？”<sup>2</sup> 这样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中国当代建筑师面对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建筑师关注何种诠释工具以及如何面对时代的反应就是建筑师何以应对社会的基本途径。要梳理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历史来了解建筑师与其社会职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要面对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社会处境，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建筑师这一职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关注当代全球化之下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建筑师活动的深厚影响。

15 世纪初，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建筑领域产生影响，建筑学得以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建筑设计从匠人手中逐渐转移到了建筑专业人士手中。16 世纪“专业”（profession）一词于欧洲产生，不久之后建筑学专业续法学、医学、神学之后，在欧洲成为固定职业。<sup>3</sup> 18 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开始，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至 20 世纪现代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起，建筑学或者建筑师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令人陶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包豪斯成为社会焦点显示了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柯布西耶用《走向新建筑》作为时代的宣言并为巴黎设想新规划，试图依靠摩天楼来创造新的社会和城市；密斯则希望引领社会从“多”走向“少”。时值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人们对技术的崇拜达到一个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一度变成了罪恶与痛苦的根源，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在伤痕及迷失之中垮掉。摆在建筑师面前的新问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

有的职业价值都受到了日益增长的抨击。公众对每一种职业能力的信心，被一系列的惊人的失败所动摇。建筑师曾承诺，如果他们能被允许按其计划建造新的公共社区，就能够实现消除肮脏旧贫民区的新乌托邦。结果证明只是一种空想。<sup>4</sup>

现代主义晚期，人们开始怀疑建筑所声称的对社会的责任和引导作用，怀疑建筑改变社会带来新希望的能力。在当代，这种怀疑进一步导致了一种混乱的局面，有时候也被称之为一个多元的时代。事实上，建筑师的确越来越把建筑依托在自我趣味和所谓专业性之上。我们生活在遗传下来的价值体系的废墟中。建筑何去何从？<sup>5</sup>建筑学的社会功能逐渐成为幻想的乌托邦，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近年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96年7月在巴塞罗那会议全票通过的一项由国际建筑协会制定的《国际建协推荐的建筑实践职业制度国际标准的协定》中，对建筑师的职业特性做出了完善的说明。该协定指出了建筑实践中职业制度的16项核心问题，其中第2项“建筑师”指出：在空间、形式和历史文脉方面，对在该地区推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福利，以及社会人居环境的文化表达负有责任。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理解建筑职业和建筑师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样的要求出现在作为第3项的“对建筑师的基本要求”之中。<sup>6</sup>1999年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指出：作为全社会的建筑学，建筑师与业主以及社会的关系至为关键。……在许多传统社会的建设中，建筑师扮演了不同行业总协调人的角色，然而，如今不少建筑师每每拘泥于狭隘的技术—美学形式，越来越脱离真正的决策。建筑师必须将社会整体作为最高的业主，承担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sup>7</sup>此外，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城市：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也表达了近年来对建筑社会性的重新思考和回归的愿望。那么，身处这种反思之下的中国建筑师该如何承担其所面对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建筑师的职业工作长期由建筑工匠担任。晚至 20 世纪 20 年代，由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归国人员构成了我国第一代建筑师，而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我国才开始有国内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建筑师学会与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出现，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方才在中国成为现实。而此时，已较之西方晚了 400 年之久。

除了职业历史的相对短暂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建筑师的出生一开始就伴随着殖民主义（早期的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某种意义上的地方性）二者之间的复杂纷争。殖民主义不仅体现在国外建筑师早期在中国垄断项目设计以及西式建筑风格的引入（例如西式折中主义的盛行），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对于后者，冯晋认为东方主义的态度主导了近代“中国式”建筑的起源，而且这种起源恰恰处于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激烈反抗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发生。<sup>8</sup> 在民族主义情绪之下的对继承传统的渴望，先天地具有了政治性的要求，其后又摆脱不了早期全球化的影响而显现出复杂的地方性特征。这样一种状况持续至今，仍然对当代中国建筑界现状起着主导的作用。然而，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当寄予期望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性的原因而在当代表现出缺席的尴尬状况时，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把它作为可以依靠的背景来建构当代中国建筑文化？当这种文化背景虚化成某些乌托邦式的建筑理想甚至空泛无物的口号时，文化不再作为建筑的真实基础而变成可资利用的想象。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当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处于社会整合中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改革，同样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重整。体现精神气质的伦理在当代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但面临着社会处于重新整合阶段所带来的诸多矛盾与困境，而且还面对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共同呼声，正如哈里斯所说：“建筑不仅表达，而且想要表达文明的价值和有关的东西。它不仅表达，它还想要表达。”<sup>9</sup>

此时，建筑如何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与精神气质，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国际建协的调查显示，建筑这一职业以各种模式存在，极少有国际的标准，而且在一些国家里，这一职业尚未真正形成。在建筑作为一种职业的历史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烙印。<sup>10</sup> 这样一种描述非常适合中国的情况。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尴尬的局面，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历史性因素极大地影响并构成了中国当代建筑界的历史文化背景。到今天，我们一方面暴露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面前，被资本影响，并在数字化热潮中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制度与经验的缺乏。我国建筑师的社会职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之下面临着责任和权力的脱节。西方建筑师在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可以凭借长久的道德传统和历史地位，再加上成熟的政府及多元利益集团的力量来对抗纯粹的资本诉求。但是，中国当代建筑师却没有如此可靠的历史与现实可依，对自身社会作用的觉醒在社会责任的催促之中匆匆而成。近来，时常见诸报刊及各种讨论会上对中国当代建筑师尴尬处境的描述，可以显露出国内建筑师对其社会价值的思考及迷惘，而此类话题出现于网络上的热烈讨论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例如在ABBS自由建筑论坛中的“七月主题：建筑学与道德”、“开发商说：中国建筑师该醒醒了”以及“中国建筑师的困境——前行的路”等话题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中，很多建筑师网友也都表现出对目前所处状况的困惑和失望。《北京宪章》中所描述的建筑师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对于中国建筑师而言，是一个尴尬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在中国建筑发展历史中，建筑师几乎从未扮演过占据如此高度的社会性角色，也几乎从未进入过真正的决策层。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建筑师却并不能因此而回避社会性的需求，也无法摆脱相应而来的社会责任。更进一步的是，当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不仅

肩负着如此苍白的历史，还要面对着全球化之下更为复杂的现在。

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多个层面上投射到当代中国建筑师与社会的关系之中。

首先，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而扩展，事实上，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sup>11</sup> 法国当代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之重点不在于物质本身，而在于一种系统化的符号关系。因此，“物”要成为“消费”对象必须成为“符号”，因为“物”从来都不是因其物质性的，而是因为其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才成为“消费”对象。<sup>12</sup> 无可避免的，建筑以及空间也被纳入这样的消费主义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发展常常被开发商所决定，开发商所遵循的不过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消费出发，使空间级差化以适应消费阶层的划分。我们在很多城市的开发进程中常常能看到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例如弱势群体被剥夺原有的生存环境，只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消费价值。建筑师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我们帮助推行的是怎样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呢？

其次，全球化使得媒介得以在整个世界蔓延。媒介把握着世界的判断标准，由此我们被告知什么是优秀的，什么是低俗的，什么是值得追随的，什么是必须抛弃的……由于媒介在当代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关键性和领导性的作用，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媒介手段对发展国家的文化殖民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尽管对待文化入侵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例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不以为然的態度，但是他仍然结合 S. 霍尔（Stuart Hall）对媒介的认识——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

关键性的领导，当代媒介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我们才得以得出一个“整体的世界（world-of-world）”——而承认媒介参与了文化变迁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sup>13</sup> 中国当代的建筑师如其前辈一样逃脱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更为依赖。媒介的高度发达不仅使得这种依赖或者说模仿具有了技术性的支持，而且使得价值标准本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这种无法逆转的文化变迁，建筑师该怎样面对身处的时代？我们是追随全球标准的统一化进程，还是需要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

此外，全球化之下的地方性建构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事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了“全球地方”（Glocal，Global + Local）的概念，他认为与其把一些现象分别归入全球性的或地域性的领域，还不如把这些现象看成是既具有全球性又具有地方性。<sup>14</sup>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经济力量逐渐强大的今天，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建构日渐重视。随着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过程之下进行的地方文化建构，当代中国建筑也表现出新的文化倾向，例如上海石库门建筑改造而来的“新天地”。这种倾向不但受着全球化的影响而折射出他者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致力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建筑师该怎样参与这一知识重建过程？我们何以应对全球化与地方性的辩证关系？

经由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轨迹，到当代面临全球化的深厚影响，我们或许发现当代中国建筑师一方面不得不面对无法推卸的社会职能，而另一方面，这种职能却展现为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何去何从？也许，哈里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理想的支点：“建筑有一种伦理功能，它把我们 from 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



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建筑的任务之一是保留至少一点乌托邦，这点（乌托邦）必然会留下，并应该留下一根刺来，唤醒人们对乌托邦的渴望，使我们充满有关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想。”<sup>15</sup>